



中西完人思维传统的差异性及其文学影响

朱丛迁

【内容摘要】 中西文学艺术创作都体现着完人思维。中国古代文学文化中的完人思维比西方更为普遍，也更加彻底。古希腊罗马神话中的神祇会显示自身的缺陷，这与中国文学文化传统中的神祇的至高无上、至善至美的完人品格形成鲜明对照。彻底的完人思维促使中国神话具有明显的神本位倾向，相较之下，西方神话系统则具有明显的人本位倾向。神本位倾向的神话是以仰视的角度看待神祇与英雄，在塑造方法和描写技巧上尽量将对象神圣化、神异化和神奇化，这一思维传统深刻影响了当代中国幻想文学创作，从而呈现出与西方幻想文学的明显差异。

【关键词】 完人思维 神本位 人本位 幻想文学

【作者】 朱丛迁，澳门科技大学助理教授。（澳门 999078）

中国文学的文化自信比欧洲文学更为明显，至少从中国传统文学文化中的完人思维可以看出。在中国文学传统中，无论是早期的奇幻文学、神话文学，还是后来的幻想文学甚至是科幻文学，作品都致力于塑造完美人格和完美形象。而在西方文学中，完人思维只体现在一些流派性的文学创作中，如古典主义文学创作往往更注意刻画完美人格的典型。但完人思维在西方文学文化传统中并不占据主导性，古希腊和古罗马神话中的神祇，包括宙斯、波塞冬，更不用说阿喀琉斯等，都会显示出自身的缺陷，与中国文学文化传统中的神祇的至高无上、至善至美、无所不能、无远弗届的完人品格形成鲜明对照。这种完人思维传统的差异性影响了文学，使得中西文学特别是奇幻文学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与特性。

东西方完人思维的差异性

中国文学特别是奇幻文学所依赖的文化传统，是一种基于圣贤之道的“益慕”^①，而圣贤便

① 宋濂：《送东阳马生序》，吴功正主编：《古文鉴赏辞典》，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1177页。



是完人思维的人格化体现,诸如伏羲、炎帝、黄帝等神话人物和传说英雄都是符合社会伦理、人生道德、理想人格的完美形象。人们曾这样理解和定位大禹的形象:“大禹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先秦儒家把大禹放在了儒家道统之中的一个重要的位置。在先秦儒家的著作之中,作为文化意象,大禹既是完美人格的圣人,是儒家之道的传承者和实践者,同时又作为具有鲜明形象的文学人物而存在。”^①这其实也是许多中国古代英雄和神话中的正神的共同特性:具有无穷的力量、勤勉刻苦的精神、高尚的人格和无可挑剔的道德,具有伟大的仁慈和冲天的义气,这是古代完人思维的典型表现。这种完人思维与神话时代对神话人物和英雄的想象联系在一起,在社会生产力比较低下的时代,人们就会致力于塑造能力、品德以及意志力远远高于普通人的完人,然后赋予他们一定的情节和伦理关系,演绎成为神话故事或者英雄传说。社会出现分工以后,奇幻文学描写的圣贤式的人物有了相应的专长,如张良、诸葛亮等偏于神算,包公、彭公等秉持正义,孙悟空、土行孙等拥有神奇的本领。他们在自己所擅长的方面都达到了完全的、登峰造极的境界,这些都是中国文化传统中完人思维的文学体现。在中国奇幻文学发展史上,完人思维的构思是贯穿性的,是较为普遍的文学表现方式。

西方文学文化传统中也有完人思维,但不像中国文学文化传统中表现得那么普遍。而且,完人思维在西方文学文化传统中也不占据主导地位。古希腊神话和古罗马神话中的神祇都是有自身缺陷的,甚至阿喀琉斯之踵这样的缺陷还成为与神话人物性格和命运紧密相连的关键症结。西方文学真正将完人思维运用于文学叙事和文学人物刻画,乃是在古典主义时期,古典主义文学习惯于从古希腊罗马文学素材中吸取艺术资源,倡导尊重王权、歌颂贤明君主、崇尚理性精神、克制个人情欲,涌现了高乃依的《熙德》、拉辛的《安德洛马克》等经典。到了浪漫主义时期,西方文学虽然善于刻画理想化的人物,但这往往并不是人格意义上的完人,而多是偏执于情感的某些方面甚至带有人格病态的人物。如浪漫主义先驱作品《哈姆雷特》《罗密欧与朱丽叶》所推出的人文主义意义上的浪漫英雄,都带有明显的人格缺失甚至缺陷,哈姆雷特的忧郁以及性格上的软弱迟疑成为其悲剧的重要因素,这样的人物是浪漫主义意义上的英雄,但不是古典主义意义上的完人,当然更不可能是现实主义意义上的完美人物。相比之下,从庄子的齐物境界和屈原《离骚》的香草美人开始,中国浪漫主义文学则一直致力于对完美人格和完美形象的刻画。这进一步说明中国文学文化中完人思维的一贯性。

中国文学文化传统中的完人思维具有某种刚性品质,在完人思维影响下塑造的神话人物或英雄形象都有超越常人的品德和能量,这样的完人思维甚至影响到当代文学创作,高大全式的人物大量出现在当代中国文学景观中不是没有缘由的。而在西方文化语境下,完人思维具有柔性特征,即可以在相对意义上刻画理想的人格形态,特别是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文学语境下。人们从女性主义文学家、思想家弗吉尼亚·伍尔夫那里很轻易地找到了完美人格的后现代呈现,那是所谓“雌雄同体”的人格方式的融合。“雌雄同体”或者说“双性同体”居然就是伍尔夫式的“完美和谐人格的追求”了。^②这里确实有人格和谐的理想境界,但这种“雌雄同体”的人格和谐完全是从性别意义上展开的,与我们所理解的社会人格和理性主义意义上的完美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中国文学传统特别是幻想文学传统,始终贯彻了完人思维,从古代和民间的神话人物,到后来的英雄传说,再到后来的乱世英雄与治世豪杰,甚至是神算先生与江湖义士,往往都体现着完人思维的特性,虽然这些人物在真正的文学表现中可能还是会显露出某些不够完美的地方。而西

① 李易中:《大禹的人格世界与文学形象》,徐中玉、郭豫适主编:《中国文论的道与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② 张昕:《完美和谐人格的追求——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双性同体思想》,《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2期。



① 以赛亚·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吕梁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61页。

②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第22—23页。

③ 王美秀等：《基督教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页。

方文学从古典神话时代起就有意无意地弱化了完人思维，所塑造的神话人物都多少带着某种人格缺陷、伦理缺陷，抑或是能力、法力的缺陷，这些致命的缺陷使得任何一个神祇和英雄都难以成为真正的完人。因此，在西方文化和文学的视野中，“那些超凡脱俗的大师们都是不正常的，有这样那样的毛病，这样那样的缺陷——赫克勒斯、埃阿斯、苏格拉底、圣保罗、梭伦、希伯来先知、酒神巴库斯的女祭司、魔鬼般的人物”等等，都是如此。^①

东西方完人思维差异性的历史分析

中国古代神话和英雄传说都热衷于塑造完美的神祇与英雄，而西方古代神话和英雄传说则较热衷于通过种种平民化的装扮和缺陷性的设计减弱神祇和英雄的完美品格，从而将他们塑造成有缺陷的神祇或者具有平民弱点的英雄。这种差异性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可以从东西方宗教思维起源的不同，也即文化原型形态的不同进行分析。

据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是在上古时期形成的宗法制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在青铜时代，中国社会的最上层坐着国王和他的王族；后者是由王和有继承王位资格的人或与有继承王位资格的人有直系关系的全部男性亲属和他们的配偶所组成的。”“上述的王族是位于一个父系氏族的尖端上；这个父系氏族的成员宣称他们都是由同一个神话传说中的祖先传下来的。氏族的下面又分为若干宗族；宗族的成员彼此都有从系谱上可以追溯下来的血亲关系，而在同一个宗族之内其成员根据他们与主干（由每一代嫡长子组成）在系谱上的距离而又分成若干宗支。”此后的“封建”则是由这些“宗支”到各自地盘上建立的“围着墙的城邑和政治领域”^②。由此可见，中国的宗法社会和封建社会像一棵枝叶茂盛的大树，将所有文化资源和血亲根源紧密联系在一起，处在根部的是整个社会成员公认的始祖，对于始祖的描述当然就必然采用完人思维，甚至采用神本位的神话思维。对于“同一个神话传说中的祖先”的叙述如果不采用完人思维和神本位叙事，就可能背负伦理的谴责，因而须将对于神的崇拜与对于祖先的崇拜完美地统一起来。这是中国古代文化时期完人思维产生的一种必然性。

与此相联系，同样在青铜文化时期，基督教文明的背景体现了西方社会的纷争与分化。代表着西方神话文化之经典集成的基督教文明，从形成的最初状态即表明，西方社会不是在中国这种统一的宗法结构中建立起来的。基督教产生之前，巴勒斯坦地区先是迦南人居住，然后遭到亚摩利人和希伯来人的入侵，而“希伯来人只不过是几个部落聚集在一起的混合部族，不能算是一个单一的民族。《圣经》中把这些部族描绘成雅各的12个儿子分别繁衍成的十二支派。其实，各部落之间并不一定有必然的血缘关系”^③。这是一个相对松散的社会构成，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的宗教文化和神话传说，自然不可能完全采用东方式的完人思维，在这样的纷争不断、血缘错综、支派林立的社会基础上，任何一种完人思维的文学形象和文化英雄都可能受到挑战、谴责与驳诘，于是所有的英雄甚至神话人物都会暴露出他们的缺陷，显露出更接近平民的那一面。

正因如此，彻底的完人思维促使中国神话具有明显的神本位倾向，而西方神话系统则具有明显的人本位倾向。神本位倾向的神话是以仰视的角度看待神祇与英雄，在塑造方法和描写技巧上尽量将这些对象加以神圣化、神异化和神奇化，实际上是站在神的立场刻画神话人物或传说英雄。于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神本位倾向从神话传统中走出来，一直走进各种各样的

传奇、历史演义之中,如《三国演义》在刻画主要英雄人物时有明显的神本位倾向,此即鲁迅所批评的“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①。再如包公、孙悟空、狄仁杰等形象,他们身上都带有完人思维的构思痕迹。这种完人思维在后来的“三突出”创作中也有创造性的发展,推出了一批“高大全”式的人物。而西方神话固然充满神性的夸张,但在神话人物的刻画中常常以常人的视角进行审视。于是,再伟大的神祇也具有普通人的性格、市井人物的情感,天上的帝王、大神纷纷降临人间,与凡间女子滥情偷欢,神人之间争风吃醋、相互算计,法力伟大而行为宵小,这些都是从人的角度刻画神祇人物的套路,体现了减弱甚至消解完人思维的人本位倾向。

研究者认为,神本位倾向的思维在中国古已有之。“在春秋以降‘礼乐崩坏’的社会大背景下,‘五祀’的等级差别和职能发生了明显变化,行神成为普通民众奉祀的重要神灵。从出土简牍《日书》文献来看,在择吉之风盛行的战国秦汉时期,祠‘行’的时日、地点、用牲的选择已深受五行学说的影响。而随着秦汉时期文化大一统下对各地神灵谱系的系统化整合,行神的形象也由抽象化的神主而逐渐人形化,反映出这一时期神灵形象由抽象化的神本位向具体化的人本位转变的演化特点。”^②完人思维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中受到了根本的改造。这一时期,在各派思想体系中都有一定的完人思维,但这样的思维已逐渐离开了神本位倾向,开始向人本位的完人思维进发。人本位基础上的完人思维在各派的思想体系中也有了不同内容,体现出该思想门派的主流价值观念。

在老子哲学中,完人往往被称为“圣人”。老子理想中的完人能非常透彻地实践“无为”：“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道德经》第二章）“圣人”具有超凡的能力和远见卓识：“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道德经》第四十七章）同时，圣人的德行修养也是出类拔萃的，圣人应该“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道德经》第六十章）这些关于圣人的表述，都是老子哲学对于理想人格的思考与设计，其实也都是对高尚、智慧的人的一种理想化定位，是在人本位意义上展开的道的设计和人格设计。这样的人其实已经无法神化，甚至也无法真正达到完人的境界。

老子的完人思维集中于“圣人”，而孔子的完人思维集中在“君子”。《礼记·曲礼》中这样定义“君子”：“博闻强识而让，敦善行而不怠，谓之君子。君子不尽人之欢，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而在孔子的完人思维中，“君子”必须怀有仁德，“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君子不能成为工具式的人物，所谓“君子不器”（《论语·为政》）。孔子的“君子”常常是在与小人对比、对举的意义上进行论证的，可见这些都是人本位的完人思维。在与小人的对比和对举中，君子的情怀、品德、风格、风范得到了突出的彰显：“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论语·颜渊》）

由此，先秦思想传统形成了完人思维的惯性，此后中国文化中的各种思想创意都不同程度地像《大人先生传》那样在完人思维的框架中塑造着理想人格，哪怕是借此刺世嫉邪。至于励志文字、抒怀之作，如《离骚》《岳阳楼记》等表现的夫子自道和国士情怀，也无不沿着完人思维的轨迹进行。完人思维是中国传统文化思维的重要特性，也是中国文学创作思维的一个重要特征。

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35页。

② 吕亚虎：《战国秦汉时期的祠行信仰——以出土简牍〈日书〉为中心的考察》，《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完人思维对当代幻想文学创作的影响

到当代文学时期，神本位以及人本位的完人思维，非常自然地进入了幻想文学写作，尤其是当代科幻文学的写作，从而成为主要英雄人物刻画的基本定式。这是因为中国文化思想的发展中从未否定过完人思维，“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一直是中国思想文化理想的伦理境界。这样的完人思维在幻想文学特别是科幻文学创作中的显现，体现出来自传统思想资源的优势，但有时也形成了中国科幻文学固有的某种缺陷。

当代幻想文学包括金庸的奇侠文学，对正面人物的设计都循着某种传统的思路，构造完人形象。这样的形象便具有了历史的厚重感和文化的内蕴，如《射雕英雄传》中的黄蓉父女，《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等。许多人都在讨论他们的形象到底是儒释道何者为主，事实上这些人物的正面品质和文化内涵仍是作家完人思维的一种呈现，但依循这种完人思维传统塑造的人物却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相当厚重的文化底蕴。

完人思维在科学幻想作品中也曾被普遍使用，但当科学成为人类欲望的加速器以后，科幻写作便一度离开了完人思维。在刘慈欣的《三体》中，就塑造了叶文洁这样的角色，虽然从任何意义上叶文洁都和圣人、完人毫不相干，但是从动机而言，叶文洁却拥有完美的动机——复仇，并且在刘慈欣的笔下，叶文洁拥有了在复仇动机上的全部“正义”。与此同时，作者用科幻赋予了叶文洁在科学能力和机遇上“完美”的复仇能力。无可挑剔的复仇动机及难以匹敌的复仇能力使得刘慈欣笔下的叶文洁被科幻赋予了另外一种完美，即“完人”的反面，可以称之为无法被谴责的“完美复仇者”。刘慈欣在《三体》中塑造生存欲望驱使的人物时，往往更体现出有条件的西方完人思维的特性，如强调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一面——不择手段地、毫无道德底线地为生存而战。道德和宗教作为人类社会中的公约数在科学幻想面前变得不值一提，甚至是反科学的、没有必要存在的，乃至在《三体》的一些章节中道德成了人类生存的阻碍因素。科学幻想在《三体》中仅作为人类欲望的放大，并没有提供足够的动机促使人物成为、抑或靠近道德上的“完人”，相反，放大欲望本身是对神性和“完人”的背离。

科幻小说能否成就“完人”？在《三体》中刘慈欣给出的答案是模糊的。宗教中的完人是道德高尚、心灵纯洁的，这些趋向于“虚无”和“纯粹”的品质和追求似乎很难被科幻塑造出来，但这并未影响刘慈欣在他的作品中塑造这类角色的决心。刘慈欣在《三体》中塑造的程心被赋予圣母般的形象，有着纯洁和美好的动机，在科学幻想的加持下，她的行为方式也类似母亲，科幻能力赋予她作为“母亲”保护人类的能力，但这种用科幻手段打造的成人童话却在《三体》的宇宙丛林法则中直接变为人类的灾难。此时科幻作为论证手段，验证了如果没有必要的生存意识和生存能力，人类单方面信奉的正义和美好以及任意一种完美的意愿、完人的品质，在黑暗的丛林法则前是多么不堪一击。

从这个意义上说，《三体》造就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试练场，《三体》中的人物离开了传统完人思维的典型意义，至多是符合社会达尔文主义要求的完人。这一方面使得刘慈欣笔下的人物缺少中国传统文化底蕴，但另一方面，如果按照传统完人思维构思作品，正面人物和英雄人物就很容易变成一种好人类型，甚至可能千人一面。在这个意义上，刘慈欣的《三体》，还有麦然的《恐龙人与我走出的秋季》^①，虽然努力在挣脱传统完人思维的过程中体现出人物形象的个性，但同时也削弱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蕴力。这或许是当代科幻文学面临的一个普遍困境。

编辑 杨义成 屠毅力 特约编辑 王磊光

① 麦然：《恐龙人与我走出的秋季》，广州：花城出版社，2016年。